

第五章 合浦汉墓的分期及发展演变

一、西汉早期墓葬

西汉早期墓葬即南越国时期的墓葬，此前在合浦一直是缺环，直至近年，双坟墩2号墩的发掘以及1987~1988年文昌塔汉墓资料的出版，我们才对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式有了初步的了解。

土墩墓的发现历史可追溯至200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课题组在大浪古城一带调查时，在距古城北约800米处的红花坎村发现2个大土墩，当地称之为“双坟墩”，疑为墓葬。遂于2004年对其中的1号墩进行勘探和试掘，因发掘方法欠妥，仅清理出一批器物，并未发现墓穴。2012年6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对2号墩进行布方发掘，最终将其确认为土墩墓。

2号墩外观呈馒头状，平面呈椭圆形，南北径为21.4米，东西径为34.7米，中部残高1.6米。是在早期建筑废弃之后，选择在较为平坦且地势略高的区域铺设垫土层，形成比周围高的土台，然后在土台的中、南部开挖墓穴。该土墩墓为一墩多墓结构，墩内共发现早期墓葬3座，均为长方形熟土浅坑，规模较小，形制简单，随葬器物均为陶器，有瓮、杯和甑3种，共计14件。

3座墓葬形制相同，其中3号墓和4号墓随葬器物为瓮和杯的组合。2号墓仅出土1件陶甑，其纹饰、陶色、陶质及制作方法与3号墓出土的AⅠ式陶杯一致。甑和杯这两种器物均可在浙江地区战国墓中找到原型。2号墓出土的陶甑与浙江安吉垅坝D12的2号墓所出的贯耳罐的形制、纹饰和陶质均相同^[1]，3号墓、4号墓出土的陶杯同浙江嘉兴地区发现的印纹陶的形制、纹饰极为相近^[2]。墓葬年代应与两广地区米字纹陶较晚的类型相当。两广地区迄今所见的米字纹陶遗存，除增城西瓜岭等部分的年代在战国晚期外，大多数应在秦或西汉早期。^[3]

双坟墩墓主为南迁的越人，至合浦后继续沿用吴越地区特有的墓葬形制。2号墩出土的小件器物，如高温、薄胎、施釉的杯和甑，系直接从越地带入，而低温烧制的陶瓮无疑是在当地仿制吴越地区的同类器物。

此外，在1987~1988年发掘的文昌塔汉墓报告中，有64座划入本期，但正如前文所述，年代较确凿的是其中34座长方形窄坑墓。这些墓葬规模较小，随葬器物也不多。出土器物的墓葬共24座，其中11座出土的器物均为越式，随葬罐、联罐、双系罐、甑、匏壶、三足罐、三足盒等器物，其余13座出土的器物以越式为主，同时发现少量小碗、釜、鼎、盒、壶、带钩等汉式器，以及少量铜制兵器、铁制兵器等。通过与广州汉墓的对比，这批文昌塔汉墓的年代应属西汉早期的后段。

二、西汉中期墓葬

本期年代上限为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下限划在汉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前后共约80年，这一时期的墓葬可分为前、后两段。

前段仍见土墩墓，但以竖穴土坑墓居多。双坟墩1号墩的年代较2号墩晚，判断为西汉中期。1号墩清理发现陶瓮2件，陶钵、碗、杯、网坠、铜斧各1件，疑为墓葬随葬品。陶瓮属几何印纹硬陶，烧制温度较高，制作精细，为南越国时期后段常见，但器物组合相较于2号墩，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除江浙越式器杯外，还出现本地越式器陶瓮以及陶纺轮、铜斧等中原汉式器，表明这一时期的汉文化已进入合浦地区，并与合浦地区文化交流和融合。在文昌塔第一期墓葬中，有30座长方形宽坑墓，绝大多数不带墓道，随葬器物多，既有越式器又有汉式器。鼎盒壶仿铜陶礼器已出现，但数量较少，组合不完备，鼎为斜足型，壶颈部短粗，多为软陶。还见小碗、釜、带钩、纺轮、铜镜、铁钺等汉式器。这类墓葬与以越式器为主的窄坑墓的差异明显，或归入本段为妥。两种不同类型的墓葬并存，应是反映设置合浦郡县之初，本地越人和外来越人生活不同的聚居区。

后段形制仍为长方形窄坑墓和宽坑墓，以宽坑墓为主。比较明确的是文昌塔第二期墓葬，共36座，其中31座为宽坑墓。已不见生土二层台结构，带墓道的墓葬普遍增多。随葬品主要有陶器、铜器、铁器、滑石器等，以陶器为主，还见少量的五铢钱以及玻璃、水晶、肉红石髓和玛瑙珠饰。随葬陶器组合以瓮与罐为主，瓮较前段的数量增多，腹部圆鼓；鼎、盒、壶继续沿用，钫出现，本段壶数量大幅增加，多为硬陶，颈部粗短，腹部圆鼓近球状，鼎、盒、钫仍较少，鼎出现矮蹄足型，盖面圆隆，深腹。井仓灶模型明器在这一时期出现，但数量甚少，单个墓中组合不完备。灶平面呈长方形，无地台和额墙，烟突短粗，多为柱状。风门岭27号墓则为单室木椁墓，斜坡式墓道高出墓底一定的距离起坡。陶器以红色软陶为主，方格纹或素身，组合以瓮与罐为主，另有仓、灶；青铜礼器见鼎、壶、钫。

后段除瓮、罐等少数越式器外，墓葬形制和多数器物均为汉式，前、后两段的截然变化，反映了合浦始设郡县后，随着汉文化的大举传入，埋葬习俗产生了深刻变化。

三、西汉晚期墓葬

本期年代上限紧接西汉中期，下限至建武元年（25年），前后共50多年。

本期发现大中型墓葬较多，且完整墓葬不少，因而资料丰富。形制方面，绝大多数应为木椁墓。部分木椁墓规模较小，无墓道，如汽齿厂2号墓和3号墓、廉乳厂2号墓、电厂1号墓以及凸鬼岭5号墓和9号墓等墓葬，其余多为带墓道的单室木椁墓，少数有甬道。大中型墓葬做法较为讲究，填土多经拍实，椁室与墓壁之间或椁室之上以木炭、卵石等相间夯筑，还以白膏泥封护椁室四周，或于椁室底部铺砂、木炭和白膏泥等以防潮。几座大

中型墓带象征“厨廡”的外藏椁，有耳室形和置于墓道底端两类。夫妻合葬在本期出现，以异穴合葬墓为主，兼有少量同穴合葬墓，男性墓规模一般比女性的大，随葬器物较多。

陶器以几何印纹硬陶为主，仅有部分红色胎软陶。硬陶以灰白色胎和灰色胎为主，烧制温度高，多施青黄色釉，纹饰丰富多样，有方格纹、方格纹底加戳印、水波纹、羽纹、连续三角纹、柿蒂纹、篦点纹等。瓮与罐组合继续沿用，方格纹底加戳印比较普遍。瓮在前期有直领如短颈，但已均为硬陶，腹部长圆，最大径居中或偏上；罐的种类多样，短颈不如前期的明显，或演变为折领，腹部大都扁圆。井、仓、灶模型明器组合大多完备，仓演变为前横廊封闭开门，仓底对穿四圆孔，灶体升高，出现额墙，早期的圆柱形烟突变为龙首形。仿铜陶礼器多仅见壶，鼎次之，偶见盒，钫仅在风门岭 23A 号墓发现 1 件。陶壶颈部收束明显，腹部圆鼓。本期新增了樽、灯、魁、卮、耳杯、熏炉、长颈壶、簠壶等器物，陶塑家禽家畜、人俑等也在本期出现。

本期铜器出土数量较多。望牛岭 1 号墓和风门岭 26 号墓等大中型墓葬随葬铜器数量约占出土器物的一半。除西汉中期的所见器物外，另有盒、三足小壶、长颈壶、提梁壶、扁壶、提梁钫、格盒、三足盘、魁、卮、风灯、席镇、耳杯等出现，器物多篆刻花纹，精致繁缛。车马器、动物模型及组合完整的建筑明器等均在本期始见。铜镜有四乳四螭镜、昭明镜和连弧纹镜。铜钱主要为五铢钱，较晚阶段出现剪轮五铢钱。

玉器发现的数量较少，仅出自大中型墓葬，种类有带钩、剑璜、璧、碗、饰品及葬玉等。滑石器在本期早些时候较为流行，且种类繁多，有鼎、壶、钫、璧、暖炉、方罐、樽、提筒、盘、杯、耳杯、釜、锅、勺、杵、白、灯、案、几、井、仓、灶、屋、厕等。风门岭 23 号墓出土滑石器最多，约占出土器物数量的一半，而年代略晚的墓葬，出土的滑石器多仅存暖炉一类。

玻璃珠、石榴子石、琥珀、玛瑙、水晶、肉红石髓、蚀刻石髓、绿松石、金银等珠饰，在本期较为流行，约一半的墓葬中见有出土，其中玻璃珠出土数量巨大。

四、东汉早期墓葬

本期年代上限在建武元年（25 年），下限在建初元年（75 年），前后共约 50 年。

木椁墓在本期仍沿用，新出现砖木合构墓和直券顶砖室墓。砖木合构墓中，如九只岭 5 号墓仅封门用砖，黄泥岗 1 号墓前室为砖圻，铺地砖，顶部用木料封盖。砖室墓形制简单，规模较小，多为单室，底部不分级，墓壁多为单砖错缝或双砖错缝结砌，单砖起券。

本期出土的陶器类延续西汉晚期的风格，仍以灰白色胎硬陶为主，陶质、陶色比较相近，但部分器型整体变小，纹饰有所简化，多饰弦纹，少量饰方格纹和各类戳印纹。陶罐数量较西汉晚期的减少，腹部较扁；瓮折领，身显直。在仿铜陶礼器组合中，钫已不见，中原式鼎逐渐减少，带三斜足的越式鼎增多；壶仍有较多出土，形体较前期小，短颈，壶

腹由圆鼓变为扁圆，圈足明显外撇。模型明器常见井、仓和灶，还新出现溷。井为圆形地台，井栏收束较明显，一般带井亭盖。仓有横廊，大部分有柱足，屋顶刻划有精致的瓦垄图案，现垂脊和脊饰，双室仓也为本期新见。灶体和额墙普遍较西汉晚期的高，龙首烟突开始简化。

铜器的数量、种类均较西汉晚期的减少，且器型变矮小，纹饰简化，篆刻花纹呈现衰落趋势。本期铜钱除五铢、剪轮五铢外，另出现大泉五十。本期沿用昭明镜、日光镜和四乳四螭纹镜，但昭明镜和日光镜的字体已发生变化，新出现四神规矩纹镜。四神规矩纹镜的出现年代或早于王莽时期，但兴盛时期却在王莽时期。

滑石器的随葬数量剧减，仅个别墓葬出土，器物仅见暖炉一类。各类珠饰在本期仍较流行。

五、东汉晚期墓葬

本期的年代上限以建初为界，下限到东汉末，前后共 140 多年。

墓葬形制以砖室墓为主，砖圜墓仍有少量发现，偶见土坑墓，如二炮厂 8 号墓和 19 号墓。砖室墓形制多样，规模较大，新出现穹窿顶合券顶墓、横直券顶砖室墓和横直券顶合穹窿顶砖室墓等。结构更复杂，墓室多由单室墓演变为多室墓，底部和券顶也多有分级，甬道、侧室、耳室、壁龛等普遍出现。墓壁及券顶一般为双砖结砌，铺有条砖和方砖。异穴合葬墓在本期仍继续流行，同穴合葬墓也间有发现。

陶器仍以灰白色胎陶、灰色胎硬陶为主，但器型普遍矮小，制作不及东汉早期的精致，但组合形式仍延续早期的。除器型高大的长腹瓮、四系瓮外，另有大口、器型较矮小的陶瓮也有出现；器型较大的罐已不多见，小罐纹饰简化，多饰弦纹，腹部扁圆，部分下坠。鼎数量少，形体较大的盒多被烧制温度较低的小盒取代。壶形体亦较小，颈部收束，腹部下坠或折腹，风门岭墓区已不见有本期的陶壶出土。溷和屋模型明器本期较流行，井、仓、灶组合多较为完备。井栏上部收束明显，下部直或斜直。仓底部有柱足，前有护栏或者封闭的横廊。出现灶面呈前高后低的灶，还出现釜与灶体结为一体的形制，部分灶身有人俑或狗，烟突简化，多作柱状。高温釉陶器、三合式陶屋、重檐陶仓及陶簋等均为本期始见。

本期随葬铜器数量不多，且制作简单，胎薄，纹饰简单，篆刻花纹铜器已少见，远不及西汉晚期的精致。常见器类有壶、提梁壶、铎壶、樽、盆、灯、熏炉、铜镜、碗、盘、削等。车马器、兵器也有少量出土。昭明镜、日光镜继续沿用，四神规矩镜较为流行，新出现云雷连弧纹镜。五铢、大泉五十仍见，新发现货泉和大布黄千。

本期的珠饰、金银器等均有所减少，显示厚葬之风已逐渐衰落。但本期零星出现了一些非贸易品，如波斯陶壶、铜钹等，而且出现了叠涩穹窿顶墓。此外，一些外来的文化因素也在本土器物上有更多的体现。

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的典型器物演变见表 5-1。

表 5-1 典型器物演变

| 器物 | 西汉中期 | 西汉晚期 | 东汉早期 | 东汉晚期 |
|----|---|---|--|---|
| 陶鼎 |  |  |  |  |
| 陶壶 |  |  |  |  |
| 陶瓮 |  |  |  |  |
| 陶灶 |  |  |  |  |

[1] 浙江省安吉博物馆：《浙江安吉垅坝 D12 土墩墓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3 年第 3 期。

[2] 陆耀华：《嘉兴印纹陶遗址与土墩墓》，《东南文化》1989 年第 6 期。

[3] 李龙章：《两广地区米字纹陶类型遗存和广州汉墓的年代》，《考古》2006 年第 4 期。